

# 云来山更佳

## ——创历史新高的中国外贸业，下一步啥打法？

本报记者 崔吕萍



8月3日，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一家汽摩配件生产企业员工在生产线上包装配件。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时间过半，任务超半。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21.34、11.66、9.68万亿元（以人民币计，下同），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分别增长24.5%、24.5%、24.4%，均为10年来新高，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0.6%、10.9%、10.2%。

成绩固然可喜，但保持清醒同样重要。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面。身在此山中，我们需要多维度指南针。

### 哪些订单可以少，什么订单会增多？

“一些点评认为我国外贸动能在下降、预期不好，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研究所所长梁明观点鲜明，“7月，出口额达2827亿美元，创下单月出口额历史新高。从数据本身来看，外贸业同样表现良好，比如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5.5%，拉高了我国出口增速14.9个百分点。”

如果简单地从统计学角度看，只要世界贸易总体能实现正增长，中国外贸的成绩就不会差，但用梁明的话说，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外贸，此刻或应更多聚焦订单的结构性变化。

去年，由于我国率先在抗疫中实现复工复产，很多国际订单转移到我国。而今年下半年，情况恐怕会出现变化。“不过这也无须过度担心。”据梁明调研，近期又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收到来自下半年国外节日的产品订单，中国外贸在2021年创历史新高悬念不大。

“假如完全恢复了，是否会有一些订单转移？”针对这一问题，梁明认为，没必要对一般加工制造业的订单对外转移太多担心，因为我国含有复杂制造技术的出口品越来越多。

而谈及中美之间贸易关系，梁明表示，今年前7个月中美之间进出口贸易都再创历史新高。“嘴上说什么不重要，行动很诚实，事实上全球抗疫进入常态化之后，大家对商品只会更依赖。”梁明说。

### 重新认识世界、自己和未来，需要入木三分的洞察力

发达国家应对经济挑战的惯用手段之一，就是印钞机开足马力，往往此时，会感受到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

“要回答全球经济主要矛盾究竟是通胀还是通缩，就要先判断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是短期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还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政策目标。”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

燕生牺牲了午休时间。

在张燕生看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一般价格水平是长期低迷的，也就是说，全球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而是通缩：“为应对上一轮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同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人们发现，印钞票并没有抬高通胀水平，而是大幅度提高了全球资产价格，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通胀还是不是一种货币现象，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是不是衡量通胀的重要指标，流动性泛滥的外溢影响究竟是什么？通过观察，一些人发现，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胀与财政赤字有了更高的容忍度，对垄断和技术泡沫有了更严厉地监管，对供应链安全和产业政策有了更高的要求，对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采取了更激进的办法，因此你就不难理解，虽然美国政府经济救助与复苏计划手笔都很大，甚至让经济学家目瞪口呆，但它实际想做的，就是以通胀来缓解通缩。”

这种背景下，中国怎么办？张燕生提出，我们要重新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自己和未来。

“2020年，我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收官，过去40年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的任务结束了，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的阶段也进入调整期；2021年，我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开局，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开局起步了，科学、法治、共富等诸多问题摆在面前，一个总要求是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由外循环为主转为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就需要我们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打造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以适应新变化。”张燕生这样说。

### 咬定目标不放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当前，围绕全球供应链的讨论也比较多，其中涉及“脱钩”，而脱钩又和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于去年8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全球企业可能在未来5年内将其全球产品的1/4转移到新的国家，其中超过一半的制药和服装生产会转移到新的国家，受影响的商品总价在2.9—4.6万亿美元之间。

“如果说供应链调整的目标之一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至少去年

和今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说明某些巨型发达经济体的目标并未实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一直会如此。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能低估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障碍。”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张宇燕看来，此时此刻，世贸组织改革面临的问题还比较多，改革与完善仍处于僵持中，下半年美欧日进一步协调立场后，有可能联合其伙伴国大力推动，不排除美国政府组建联盟进一步孤立中国的可能。

“对于我们来说，当前区域合作的好消息来自越来越多的国家议会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会。中日两国立法机构的认可，可以说标志着RCEP真正走上了轨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RCEP将使全球收入每年增加1860亿美元，为成员国经济增长贡献0.2个百分点。”张宇燕这样说。

“当前，疫情正在世界范围形成第三次高潮。对此，党中央也早就作出了‘常态化’的判断。世界经济总体上还在恢复上升，我国作为率先复工复产、产业链相对完整的国家，仍占据世界经济复苏的先机。”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的话说，中国经济没有近忧，但有远虑。

“过去我国经济更多是外向型，内部联系比较薄弱。目前，疫情的天灾和西方脱钩的人祸都在抑制我们‘外向’，因此，在坚持外贸优进优出的同时，我们更应抓住机会搞好‘内循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相对突出的。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有许多需要练好内功的地方，因此我们应着力加强主体建设，何不借此机会，多练练内功？”在季志业看来，我们需要尽快把对外经济中“富余”的部分，有效转移到对内经济中来，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深圳、浙江提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是代表了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季志业这样说。

对此，季志业有个建议，重新考虑外汇储备的分布结构，未来重点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增加收益，也应包括如何带动我国经济。

# “十四五”期间应抓紧建立我国绿色低碳贸易体系

本报记者 李元丽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逐步发展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十三五’末，我国出口商品国际市场份额达14.7%，创50多年来单一经济体最高纪录。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全国政协常委、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展望“十四五”，贸易将在双循环中发挥枢纽作用。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贸易发展方式，加快构建绿色低碳贸易体系。

在钱克明看来，目前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30%，外贸企业大多为制造业中的行业领军企

业，且产业链条长，供应链范围广，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少数”，外贸企业率先实现碳达峰，将对我国制造业整体转型起到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目前发达国家在抢占应对气候变化道义制高点的同时，也在抢抓标准和规则制定权，以期巩固其在环境技术、低碳产品及服务上的优势，并形成防范竞争对手的“绿色壁垒”和“碳关税同盟”。面对绿色门槛日益提高的国际贸易环境，我们必须加快培育绿色竞争新优势。这也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需要。

那么，如何构建绿色低碳贸易体系？钱克明表示，要加快形成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大先进制造业和风电、光伏等节能环保领域投资，开展绿色流通体

系建设，倡导绿色新型消费，对“生产—流通—消费”全周期、全过程进行绿色化改造。同时，建立健全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摸清森林、海洋碳汇资源家底，加强碳汇资源管理。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扩大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逐步将石化、化工、建材、钢铁、造纸、民航等行业市场主体纳入交易体系，增强流动性，促进形成合理碳价，并探索与国外碳市场链接及交易互认。此外，还需建立税收激励机制，逐步整合国内与降碳相关的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等税种，适时开展碳税试点，探索建立独立碳税机制。

“我们还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贸易。优化贸易结构，积极推动高质量、高附加值绿色产品和技术进出口，开展绿色低碳贸易试点，引导企业逐步降低出口产品含碳量，规避‘绿色壁垒’。”钱克明表示，加强外贸商品碳排放管理，完善全产业链条碳排放数据统计，准确测算重点进出口行业碳排放数值，探索建立外贸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追踪体系。支持出口企业积极开拓绿色产品国际市场，获取国际碳足迹认证，提高品牌附加值和竞争力。强化理论支撑和政策储备，系统研究碳定价、WTO合规性等问题，启动我国征收碳关税可行性研究。最后，积极参与全球碳税治理。反对单边强加碳关税措施，开展绿色低碳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绿色认证、碳标签等国际规则制定，在碳计量、碳定价等方面推动制定于我国有利标准，从我国制造业大国实际出发，主张基于消费而非生产的碳减排责任。

程度深化。公开材料显示，湖北省将持续深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碳市场建设，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目标，研究扩大试点碳市场覆盖范围等工作，促进企业节能环保改造，倒逼落后产能转型；北京则表示“十四五”将开展碳减排专项行动，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承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管理和交易中心。

那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全国碳市场”）启动后，下一步，各地应如何利用碳市场手段开展工作，促进本地低碳发展？杨素指出，由于此前地方市场配额分配方法、交易制度、交易流程、碳价差别较大，远期看，各地方碳市场规则如

何向全国碳市场规则统一，企业所持配额如何结转，也是地方碳市场与全国碳市场协同发展的一大难题。“虽然全国碳市场已经启动，但地方试点碳市场仍有很大借鉴价值，其更符合本地排放特征，可以作为全国碳市场的有益补充。”杨素坦言。

在潘荔看来，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下，面对全国碳市场逐步完善，地方碳市场亦需要主动作为，寻找创新发展点，持续发挥地方试点碳市场对本地节能减排、能源转型等方面的倒逼作用。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目前，实现地方与全国碳市场协同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未来两个市场要实现有效协同，还需要深入研究。

# 厉以宁讲道德经济学

刘焕性

道德经济学及其相关问题是厉以宁老师近30年来讲得较多的话题之一。2018年1月，厉以宁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的发言中讲到，效率主要分为三种，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道德效率。他指出，生产效率就是多少投入有多少产出。假定投入不变，产出增加了，就表示效率增加了。生产效率一般被认为是微观的效率，是企业的事。资源配置效率是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兴盛起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宏观的效率，资源配置有各种方式，如果改变一下配置方式，效率就增加，这就表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但这两种效率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就是假定人是为自己利益着想，要求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逻辑基础，但社会人假设却与之相对，认为人们在追求物质需要的同时，还能够承担对组织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并且能够以道德自律的方式进行自我治理。随着社会人假设的出现，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出现了第三种效率，那就是道德效率。以道德为基础所产生的超常规效率。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发展方式红利，更应当创造社会和谐红利。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根基，而社会和谐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 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调节

厉以宁认为，效率的调节应该分三种。第一种是市场调节，依靠市场规律来调节。市场调节不够，就靠第二种政府调节。根据法律法规制度，有了政府调节，就有宏观管理。但还有第三种调节，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2016年12月，在网易经学研究会年会“展望2020”主论坛上厉以宁讲到，“市场什么时候有的？几千年前的事情，在原始部落之间开始进行了交换，这是最早的市场。政府调节比这要晚，只有有了国家、有了政府，才有了调节。人类社会存在了多久？少说有几万年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的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习惯、惯例、道德理念。”厉以宁认为，经济学研究是谈效率的，始终认为效率很重要，效率有两个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和道德基础，两种基础是并存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效率能够保证大家得到常规效率，但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的问题。把效率变成以道德为基础，才能产生超常规效率。厉以宁说，“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超常规效率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抗日战争的时候，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的时候，万众一心捐款捐物、献血救灾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移民社会为什么效率高？比如广东、福建一带的客家人，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间关东的山东、河北移民，“走西口”的山西、陕西人和甘肃人，“走南洋”的福建、广东和海南人，就是因为文化把他们凝聚在了一起，有一种团结、友爱和互助精神，超常规效率主要来自道德基础。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效率问题我们也需要重新考察，以便更好地发挥道德调节的作用，将市场经济的负效率逐步降低与减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2015年1月，厉以宁在“第二届中国财经领袖年会暨2014中国财经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的发言中表示，不仅市场需要道德调节，不然市场就失效了；政府也同样需要道德调节，不然政府调节同样也会失效。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调节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道德力量调节首先要靠自律，每一个个体都要自律，无论是企业工作者、政府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必须自律。自律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道德底线不能破；二是自我勉励，当一个人遇到挫折遇到困难时，是就此沉沦还是奋发起来，这也是自律。自律实际上是在发挥道德力量对个体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自律是无形的手，而文化建设是有形的手，比如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城镇文化建设等，这些都不属于政府调节，而是道德力量的调节。还有乡规民约，既可以公告等有形的形式显示出来，也可以宗族或家族等无形的形式传承下来。所以，道德力量的调节在有形无形之间。以后证券市场如果政府不再用审批制，而是用规范的注册制的活，同样不可忽略道德力量的调节，因为道德力量的调节既能使每个人自律，也能使整个的证券市场走向规范，这样中国股市的发展会更好。我们现在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都表明了自律的重要性，表明了道德力量的重要性，国家要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三种调节就都必须有，缺少哪一种都不行。

### 市场经济和企业效率应以道德为基础

2014年4月，厉以宁在第五届紫光阁论坛上的演讲中谈到，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岁月中，即使后来有了市场、有了政府，但在一些偏远地方，政府力量还是难以达到的。道德力量也到不了。这种地方仍然有人居住、有人群生活，为什么？还是道德力量在发挥调节作用。社会生活是个大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中，交易行为只是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都属于非交易领域。家庭关系、家族关系、社交关系、街坊邻居关系等，都属于非交易领域。在非交易领域中，社会生活靠什么运转？市场的力量进不去，因为这不是市场活动。政府调节只规定了大致界限，社会生活不能违背法律。但是在多数领域和场合还是道德力量在调节。我国古代有句话：“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乱，乡下人往城里跑，因为城有城墙，有兵把守，所以乡下人投奔靠友到城里来。大乱居乡，更好地把资源用好用，跑得越偏僻越好，为什么？因为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跑得越偏僻越好。在古代历史上的很多战乱时期，市场是瘫痪的，起不了作用，政府是无能的，在混乱期间也管不了那么多。但人类社会依然存活了下来，靠的就是道德力量所起的作用。在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它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以后，必须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调节，这样市场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一个没有道德力量调节、没有信用体系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的。

2016年10月，厉以宁在“北京大学企业家论坛—中国创业者2016峰会暨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落成仪式”上表示，道德力量更能够提高企业效率，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企业家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做到严格自律并且积极建设企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并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他说，既然效率有它的道德基础，那效率的意义就更深远，它能够激励每一个微观经济单位，也是每个企业，更好地把资源用好用，能够以更少的投入产生更多的收益。所以企业要想提高企业的效率，除了依赖厂房、原料、机器设备等物质技术基础外，还依赖于道德基础。超常规的效率从哪里产生？来自道德理念。企业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名声，一个企业家在对员工时，既要学会管人、用人，也要学会容人，还要严格要求自己并积极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工人会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很光荣，所以完全有可能在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情况下来增加正效率。如今社会工业化迅速，谁都无法预料到50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不过，道德力量以及社会责任感却是永恒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应树立的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还有道德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和创新发展。

道德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道德经济学是以道德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这一概念虽然在名称上与经济学、伦理学有直接关联，但其提出、发展与完善却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张关注下层、强调“从下往上看”的新社会史观的兴起有密切联系。厉以宁很早就关注道德经济学问题，但他关注的重点却是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面临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诸多挑战，如何走出一条市场规律与道德价值相衔接的发展道路，摆脱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 道德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在1999年出版、2009年再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厉以宁谈道：“照理说，道德、伦理问题本身并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是不专门讨论这一领域问题的，经济学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但“对资源配置、社会经济运行，以及社会生活水平发生作用的，不仅仅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而且还有习惯与道德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规范、伦理标准，是非判断等，不仅在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研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所以，经济学研究不能回避道德伦理的研究。道德经济学是由多种深层结构性因素所驱动的，它们与信息社会的价值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将重新在新市场的开发与拓展、新投资者和新创业者的进入与公共产品的供给等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最终在美德和财富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2016年6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一文，提出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从林权改革到农村土地确权、农村新气象和农民创业热、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经济新常态和转变发展方式等八个方面构成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内容，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发展创新的重大成果，会继续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并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而茁壮成长、开花散叶。

过了两年之后，厉以宁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说，现在看来中国特色经济学还应加上道德经济学的相关内容，我国党和政府所讲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中国特色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经济治理方面应当综合运用市场、政府和道德这三种力量，这也印证了道德经济诞生的因素蕴藏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因此，在研究中国特色经济学时应纳入对道德经济学问题的研究，这有助于更好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作者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 专家建议做好地方试点与全国碳市场创新协同

本报记者 李元丽

中国的碳市场建设是从地方试点起步的。

2011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7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2013年起，7个地方试点碳市场陆续开始上线交易，有效促进了试点省市企业温室气体减排，也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摸索了制度，锻炼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2017年末，经过国务院同意，《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印发实施，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1年7月16日，属于中国的“碳交易”正式启动。

地方碳市场先试先行的探索，为全国碳市场顺利开市以及继续深

入扩大提供了经验支撑。“无论是北京、湖北，还是上海，各具特色的地方碳市场在碳市场配额分配、交易制度等方面都已建立成熟体系，均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运行夯实了根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潘荔说。

在国网能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杨素看来，全国性市场的顺利启动，地方碳市场试点经验“功不可没”。地方碳市场试点运行以来，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保持较高水平，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重庆、湖北、广东等地政府已经明确了下一阶段试点碳市场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均在前期基础上进行了一定